

專輯序言

風險社會與危機傳播

黃懿慧

二十一世紀是個風險四伏、危機密集的年代。環目四看，現代社會面對眾多性質不一的風險及危機，包括人口壓力，雨林毀滅，溫室效應、傳染病跨境蔓延、當權者的貪污腐敗、政權重組、社會動盪、戰亂、道德與公信失衡、虛假資訊的氾濫、輿論起哄、社會話語權的爭奪、全球化引起的衝擊、企業及政府的表現與公眾期待的鴻溝，以至如今正在影響世界的金融海嘯，及日常所見的勞資爭議、人為惡意、管理失當、產品瑕疵與召回、消費者訴訟與抗爭、網路謠言、價值偏差及專業道德與醜聞事件等等。單就2008年間所發生的危機事件觀之，歷歷在目者即包括：香港淫照事件、台灣健身俱樂部龍頭亞力山大停業之消費者權益爭議、大陸雪災、四川地震、松花江苯污染、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乃至於迄今仍嚴重影響全世界的金融海嘯，遑論因科技研發與現代化所引發的傷害、污染、歧視以及貧窮等問題。凡此種種，有源於天然災害，有源於人為因素，也有源於科技發展、更有一些是源於社會結構的改變。無論危機或風險的大小及性質，它們皆直接或間接衝擊組織之決策與溝通行為，成為挑戰政府、企業、傳媒乃至於社會傳播的新課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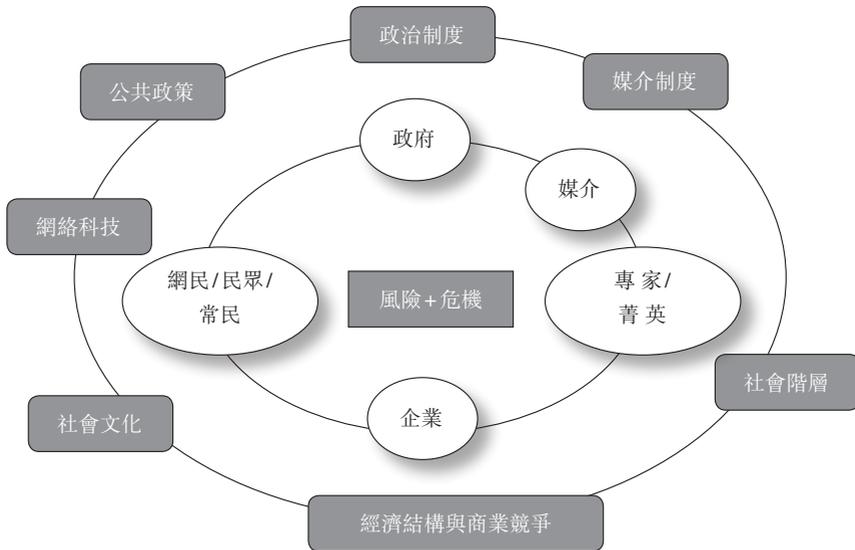
黃懿慧，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專任教授。其研究領域包括：傳播與溝通管理、公共關係管理、危機管理、衝突與談判，以及跨文化關係研究等。電郵：yhuang@cuhk.edu.hk

Ulrich Beck (1992) 在其《風險社會》(*Risk Society: Toward a New Modernity*) 一書中即明白揭示：科學、科技、工業乃至於現代化(modernization)之發展，雖然為當代社會創造許多機會與「福祉」，但同時也成為另外一連串「風險」(risk)與「災難」(hazard)的肇因；而且，這些風險與災難無論在廣度、嚴重性乃至於時間面向上的後果及影響，皆是人類始料未及且無力控制的。

有鑑於此議題的重要性，中大傳播學訪問學者計劃於2010年1月進行為期一個月的深度工作坊，旨在集合華語學者，以多元視角探索風險社會之危機傳播所涉及的成因、傳播模式，乃至於其與宏觀、微觀社會結構間之互動、關係及影響。其中七篇論文經過匿名審查業，收錄於本期以「風險社會與危機傳播」為主題的特刊中。

整合七篇論文的研究旨趣與核心概念，圖一「風險社會之議題、核心參與者與情境元素架構圖」，羅列「風險社會中之危機傳播」的主要議題、核心參與者與情境元素。

圖一：風險社會之議題、核心參與者與情境元素架構圖



就廣度而言，七篇論文探討的核心概念不論是以「風險」為主軸、以「危機」為主幹，或以天災、人為事件或環境醫療為分類基礎，主要都取2008至2009的重大事件為觀察重點，包括：汶川地震、2008年金融危機、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H1N1疫情以及全球暖化問題。危機事件或風險議題的核心參與者則包括：政府、媒體、專家菁英、企業以及民眾(或常民)與網民。此外，風險傳播或危機溝通的概念則涵蓋：認知、知識、態度、傳播、訊息交換、溝通對話、參與、管理與控制。此外，也是最重要的，所有論文皆將事件或個案置於社會、政治、政策乃至文化情境因素中進行關聯性探討；討論的情境元素包括：政治制度、媒介制度、公共政策、科技網路、社會階層，乃至於經濟結構與商業競爭。

在深度面向上，以下探討重點乃為跨論文之共同關懷：賦權(政府與科技相對於民眾與網民——潘、吳、司文)、博奕(政府與媒體、專家與常民、西方與本土、維穩與嘗新——潘、徐、吳、司、李、史文)、(有限)理性與情緒(潘、吳文)。總結言之，風險社會幾已成後現代社會之主要副產物。風險、不穩定、不確定、以及無所不在、一觸即發的各類危機事件，使得當權者——政府、機構、菁英創造各類制度亟欲「維穩」，然而，可以想見的是，各類核心參與者與情境元素仍會持續參與博奕。因此，預期這種混亂—維穩—博奕—談判協調乃至折衷，或另起新一波的混亂循環，仍將持續進行。

以下簡述七篇論文的研究旨趣：

1. 潘祥輝的〈論中國語境下的危機事件與媒介制度變遷的內在關聯——以汶川地震和群體性事件為例〉，分析危機事件與中國大陸媒介制度變遷的關聯性。作者深入探討個案中傳媒與政府的互動，並提出理論架構，試圖解結構危機事件如何成為制度變遷的契機。
2. 徐美苓與楊意菁的〈台灣全球暖化風險溝通的常民認知〉，則以問卷調查法，探討常民在「全球暖化」議題上的認知及參與之影響因素，並提出對於風險溝通之具體建議。
3. 史安斌的〈情境式危機傳播理論與中國本土實踐的檢視：以四川大地震為例〉，以危機情境理論為本，對2008年中國政府在四川地震

上的傳播策略與效果進行分析，並對西方情境理論模式在中國的適用性上提出反思。

3. 吳宜蓁的〈運用網路社交媒體於風險溝通——以2009–2010年台灣政府H1N1防疫宣導為例〉，則探討台灣疾病管制局在2009至2010年間如何運用網路社交媒體，進行H1N1防疫宣導與溝通，同樣的文末也提出具體建議。
5. 李明穎的〈科技民主化的風險溝通：從毒奶粉事件看網路公眾對科技風險的理解〉，則從三聚氰胺(稱為毒奶粉)事件分析台灣政府對於事件的危機處理，以及民眾參與及理解科技風險的情形。
6. 陳智傑的〈機構的風險責任與公共論述——傳媒呈現香港滙豐控股負面消息的個案研究〉，以金融業議題為例，透過內容分析與文本分析，探討傳媒在金融風險與風暴中的角色，尤其聚焦於探討傳媒能否與是否會發揮「社會警報」功能的條件。
7. 司景新〈共識的焦慮：中國媒體知識分子對危機與風險的論述〉，則在風險社會的前提下，觀察中國大陸媒體知識份子對於汶川地震、毒奶粉事件，以及金融危機三個案之時評，試圖揭示傳媒之符號建構、社會群體利益、以及社會共識間等概念間的關係。

本文引用格式

黃懿慧(2011)。〈風險社會與危機傳播〉。《傳播與社會學刊》，第15期，頁27–32。

Crisis Communication in Risk Society

Yi-Hui HUANG

Abstract

Crisis and risk have received increased atten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This special issue explores the contextual factors surrounding the risk society and their potential implications for risk communication. Seven articles investigated the events in 2008 and 2009 that involved crisis and/or risk in their nature, and natural, human-made, and medication in their categorization. Adopting a multi-perspective approach, this special issue examines the causes, communication models, and their delicate interactions with micro- and macro social structures.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Huang, Y. H. (2011). Crisis Communication in Risk Society.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5, 27–32.

Yi-Hui HUANG (Professor).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esearch interests: public relations management, crisis communication, conflict and negotiation,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s and relationships